

先秦至清汉语方位词发展演变史研究

# 汉语方位词『前』『后』 发展演变史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Direction Words Qian and Hou

施建平 著

非外借



暨南大学出版社

先秦至清汉语方位词发展演变史研究

# 汉语方位词“前”“后” 发展演变史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Direction Words Qian and Hou

施建平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方位词“前”“后”发展演变史 / 施建平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6

(先秦至清汉语方位词发展演变史研究)

ISBN 978 - 7 - 5668 - 1770 - 9

I. ①汉… II. ①施… III. ①汉语—名词—语言学史 IV. ①H14 -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4145 号

## 汉语方位词“前”“后”发展演变史

HANYU FANGWEICI QIAN HOU FAZHAN YANBIANSHI

著 者: 施建平

.....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杜小陆

责任编辑: 齐 心

责任校对: 何 力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4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语方位词句法语义演变史”（批准文号：11YJC740087）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 总序

汉语中的方位词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类词，它属于名词的一个小类，但在句法功能上又与名词大相异趣。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对汉语方位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收集过一些材料，还为此写过一篇小文章（未刊），后来因为移情别恋于别的课题，就将方位词的相关材料束之高阁了。

2010年前后，我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目前在苏州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就职的施建平同志来找我咨询有关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事宜，我便竭力向他推荐汉语方位词研究这个课题，希望他花些功夫，做些源流梳理工作，对现代汉语中的方位词系统的形成脉络做个初步的揭示。施建平同志是个有科研激情的人，一旦碰到好的课题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当他发现汉语方位词的发展演变这个课题在国内尚未得到很好开展的时候，就一头扎了进去，开始了研究前的一系列热身工作，并以此为课题申报了2011年度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结果获得评审专家的青睐得以立项。这也是苏州市职业大学建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二个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给予资助的项目。

课题的跨度很大，从先秦开始一路追踪到清代晚期，绵延数千年。课题的难度之大，恐怕是施建平同志当初所未曾想到的。要做到精准描写，必须要计量；要计量，必须先要建语料库。有了语料库，披沙拣金的工作量就大得惊人，因为“前、后、上、下、左、右、东、西、南、北”等既可为动词，也可为方位词。披沙拣金之后，每一种用法在某部文献中的分布情况统计又是惊人的工作量。这也就是该课题原本计划于2014年结项，结果却一拖再拖的主要原因。

国内各级各类的项目一般以两到三年为研究期限，如果做一部专书语法专题研究，尚能从容对待，但是若对某一类语法现象做跨度千年以上的历时研究，则无疑显得紧迫。民间有慢工出细活之说，一切精品都是在雍容休闲的状态下反复打磨而成的；每天计算着时间的长短，被时间追着奔跑，是出不了好结果的。

在繁重的工作量面前，施建平同志显然压力巨大，便跑来求助，希望我

能在计量统计的过程中施以援手。于是，苏州大学文学院的几位研究生便挺身而出，李璐同学承担了方位词“左、右、东、西、南、北”的计量统计工作，季林莉同学承担了方位词“上、下”的计量统计工作，胡敏韬同学则承担了方位词“内、外、里、中”的计量统计工作。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碰头会，大家交流在计量统计过程中碰到的疑难问题，我也尽量参加并给出一些建议，但个中的舛误仍然在所难免，我们也只能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并于今后的修订中加以完善。

既然答应给人作序，总得说几句好话。

这套丛书作为一个青年项目的结项成果，初步地且勉为其难地完成了汉语方位词从先秦到清代晚期的发展演变情况的大致勾勒和描写。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顺带也先后完成了对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这七个时点的七部代表性文献的方位词句法语义特点的专书计量描写，为今后学人的深入研究和精确描写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同时，在讨论过程中，作者能不时地印证前哲和时贤在方位词研究中提出的论断，也能对其中的一些论断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如《世说新语》中有单音节方位词单独作谓语的用例，因此，林晓恒在《中古汉语方位词研究》一书中指出《世说新语》中没有单音节方位词单独作谓语的例句，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又如邱斌在其《古今汉语方位词对比研究》一书中将“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中的“北”视为作主语的用例，显然是欠妥的，此处的“北”修饰动词“伐”，应是作状语。

一部汉语方位词句法语义演变史究竟应该怎么写，施建平同志给出了他的初步解答。平心而论，他的解答就整体而言是略显粗糙的，但其筚路蓝缕，先行探索的首创之功还是值得肯定的。我倒是认为，施建平同志的探索实践，更大的意义在于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汉语方位词句法语义发展演变问题的关注，并在他初步勾勒的基础上建构一部更加翔实且令人信服的汉语方位词发展演变千年史。

曹 炜

2015 年冬

于苏州市区学士街学士花园寓所

# 前 言

如果说人类语言学的发展史是一条长河的话，那么汉语方位词就是汉民族语言河流中一块小小的沙洲。时间在流逝，而它却越来越壮大，成为汉语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从动物都能感知的方位意识，到后来人类方位概念的形成，以至最终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语言的产生而出现的表示方位的字符……方位字（词）见证了人类由黑暗到光明，由野蛮到蒙昧，最终走向文明的漫长历史。

与方位字（词）的诞生一样，本书由课题的申请而萌发了写作计划，由构建方位词史的使命而披荆斩棘，历尽艰辛，历时五年，方初具规模。

## 一、研究的理论价值：方位词是汉语言中一个特有的词类

本书是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汉语方位词句法语义演变史”（11YJC740087）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共3册）。方位词是汉语词汇的语法类聚中极为重要也饶有趣味的一类词，用法多样，语义丰赡，且富有变化。目前，汉语史的断代描写、共时研究等正在进行，而方位词的发展演变史的描写是不可或缺的，本书试图描绘出方位词“前”“后”的发展演变史。

## 二、本书写作的动机：建构方位词史的时机已经成熟

虽然汉语方位词演变史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但是建构汉语方位词史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此前我们的同行做了许多部专书的或断代的方位词研究，主要有侯兰生的《〈世说新语〉中的方位词》（1985）、王镛的《唐诗方位词使用情况考察》（1995）、张世禄的《先秦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1996）、甘露的《甲骨文方位词研究》（1999）、林晓恒的《魏晋至唐基本方位词语义研究》（2006）、马小成的《〈水浒传〉方位词研究》（2007）、龙江洪的《〈西游记〉方位词研究》（2008）、宋殿伟的《〈祖堂集〉方位词研究》（2008）、董孝一的《〈金瓶梅词话〉方位词研究》（2009）、冯赫的《元刊杂

剧方位词特殊功能研究》(2010)、刘艳红的《唐五代方位词研究》(2010)等,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在建构汉语方位词史的时候,不必在断代共时研究这一块花太多的力气。当然,除了作为项目负责人的笔者之外,本课题组成员如王莹、蔡思杨、江慧慧等,在读研期间也对方位词的一些专书做了深入研究,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 三、本书的内容及创新之处

本书作为系列书籍的第一本,共五章。第一章主要研究了方位概念、汉语方位字的产生。夏商时代,人类即已产生方位概念,但是其方位的广度和精度,远非今天所能比较,往往局限于一个村落、一个城池等区域。譬如“中”字的甲骨文就是一面旗帜,上面往往刻有族徽,以便外出劳作的人记住回来的方向和路途(夏商时的气候比现在湿润,中原、华北等绝大多数地区的森林都比现在茂密得多)。第二章研究了“方位词”概念的来龙去脉。它与19世纪末的《马氏文通》、陈承泽的《国语法草创》有着一定的渊源,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最早提出“方位名词”的概念。经过梳理,我们发现方位词这个年轻的词类,最早在20世纪中后期才正式确立。第三章描述了方位词的源流。一般认为“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内、外”等词在甲骨文就已经出现了,在金文出现的方位词如“前”“后”等,而“里”(裏)是黄廖本《现代汉语》“14个典型方位词”中出现得最晚的一个,秦汉以后才开始有方位义。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研究了“前”和“后(後)”这两个词的发展演变史。

之前,虽然有蔡言胜的《〈世说新语〉方位词研究》(2008)、林晓恒的《中古汉语方位词研究》(2011)、邱斌的《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2008)、王红厂的《复合方位词“前后”“左右”“上下”研究》(2009),但这些著作或是专书研究,或是断代研究,或是部分历时描写,对汉语方位词进行全面的全景式描述,尚无人涉足。

本套丛书(三册)试图完整地呈现汉语方位词“前、后、左、右、上、下、东、南、西、北、里、外、内、中”14个典型方位词的系列断代描写景象,第一次全面揭示汉语方位词的历史发展脉络。

关于本书写作的几点说明:

一是写作素材的搜集与整理。凡是前人撰写的著作、论文,笔者皆经过认真考察、论证之后,方采纳或引用。笔者经过研究,发现一些前人研究的数据可能存在瑕疵或不适合直接引用的,均重新找到原始文本进行全篇考察



(如《论语》《世说新语》《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等)或抽样分析(如《战国策》《祖堂集》等),以便最大限度地接近研究的真相。

二是版本的使用与数据的甄别。本书所使用的语料,均为典范、权威的著作版本,如《甲骨文字典》为徐中舒先生主编的四川辞书出版社版本,《金文编》及《十三经》中用到的《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等,皆为中华书局版本。先秦以降之语料,如《史记》《战国策》《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敦煌变文选注》《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等,皆为中华书局最新版本,《〈祖堂集〉校注》《朱子语类辑略》等是商务印书馆的精校版本,近者如《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等,也是在反复比较、甄别的基础上,选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代表最新研究成果的版本。

三是关于本课题组成员科研成果的引用。本课题组成员蔡思杨、江慧慧、王莹等在宋元时期语料研究的基础上,各自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对本书的写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宋元方位词‘前’的语义及语法演变”、第五章第四节“宋元时期‘后’类方位词的语义及语法演变”就是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

限于本人的学力和水平,本书的谬误与差错一定不少,恳请专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施建平  
2015年1月

# 目 录

- 总 序 / 001
- 前 言 / 001
- 第一章 方位概念、汉语方位字的产生 / 001
- 第一节 方位概念的产生 / 001
- 第二节 方位字的由来及古今研究状况 / 003
- 第二章 “方位词”概念的由来及古今研究状况 / 011
- 第一节 “方位词”概念的由来 / 011
- 第二节 方位词与名词、处所词的关系 / 018
- 第三章 甲骨文、金文方位词研究 / 023
- 第一节 甲骨文方位词研究 / 023
- 第二节 西周金文方位词研究 / 044
- 第四章 “前”句法语义的历时演变 / 077
- 第一节 方位词“前”的来源及先秦时期的“前” / 077
- 第二节 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间方位词“前”的句法及语义演变 / 082
- 第三节 唐五代时期方位词“前”的语义及语法演变 / 093
- 第四节 宋元方位词“前”的语义及语法演变 / 108
- 第五节 明清方位词“前”的语义及语法演变 / 121
- 第六节 “前”类合成方位词的语义及语法演变 / 136
- 结 语 / 171

第五章 “后(後)”的句法语义演变史 / 175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后(後)”类方位词的源流及其发展 / 175
- 第二节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类方位词的发展 / 180
- 第三节 唐五代时期“后”类方位词的语义及语法演变 / 191
- 第四节 宋元时期“后”类方位词的语义及语法演变 / 203
- 第五节 明清时期“后”类方位词的语义及语法演变 / 215
- 第六节 “后”类合成方位词的语义及语法演变 / 230
- 结 语 / 237

附录一 《儿女英雄传》方位词数量统计 / 243

附录二 《散氏盘铭》释文 / 245

后 记 / 247

# 第一章 方位概念、汉语方位字的产生

## 第一节 方位概念的产生

### 一、方位概念的定义

方位概念是空间概念的一部分，而空间概念是人类认识自身及自然、社会的基础。概念是人类思维中的一部分，也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它反映客观事物一般、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了概念。如从“白雪”“白马”“白头”等事物里抽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得出“白”的概念。方位概念由“上一下”“左一右”“东一西”“里一外一中”“前一后”等相关的方位词组合而成。

### 二、方位概念产生的时间及依据

方位概念是随着原始人类对自身及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入而日益清晰起来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不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包括方位概念，都是一种心理意识活动，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现代神经生理学也证明，人的思维认识活动是以大脑的生理活动过程为基础的。<sup>[1]45</sup>

因此，方位概念几乎是与人类的思维、语言同时产生的，甚至可能还要略早于语言。

### 三、从方位感到方位概念的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以来的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人类具有“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进化特征。在中国新发现了的 60 多处古人类化

石地点、近千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表明，在距今约 200 万年前我国境内已有古人类出现。

中国南、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序列的确立及其各个时期文化面貌的研究，揭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独特面貌和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与此同时，中国远古人类体质特征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远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具有连续进化的特点，其间看不出有重大的断裂，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文化和人类行为所具有的连续性相吻合，从而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的论据，为解决世界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不容忽视的资料。<sup>[2]18</sup>

马克思告诉我们，人的思维发展的成熟程度和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是一致的。<sup>[1]</sup>当语言发展到概念语言（即分音节语言）阶段，亦即人类发展到晚期智人<sup>①</sup>时期，一般学者认为，这时“分节清晰的概念语言已占据了优势，人们之间起码可以按照不同的语法结构相互交流了。含糊不清的呼叫和其他的辅助手段已经大大减少，并局限于一定的场合。这一时期的人类，已进入了旧石器中期的早期智人时代。其代表类则为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我国的丁村人、马坝人及长阳人”<sup>[1]157</sup>。

这时人类的工具已有巨大的改进。中国的丁村遗址，出现了新的石球和具有独特风格的三棱大尖状器。石球同兽筋或植物的纤维（如藤条）连接起来，用来袭击动物或缠住它们的四肢；三棱大尖状器可以帮助刮削器剔出动物的筋骨或挖掘植物的块根。“他们能够制造较复杂的石器，有狩猎大的哺乳动物（如巨大的洞熊）的技巧，有埋葬死者的仪式，也可能知道穿衣服……”<sup>[3]151</sup>

由上可知，人类的进化史也是一部人类的思维与语言的形成史，当然也是方位概念的形成史。通过对动物的实验与观测，人们发现即使是脑容量占身体比重很小的动物，也有很强的方位感。飞鸽传信、老马识途，这些现象证明了一点：动物在不依赖语言的情况下，也有很强的方位感。

在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人的方位概念应该是从猿的方位感发展而来的。

从早期到中期，再到晚期，经历了整个旧石器时代。通过人脑心智的科学实验，结合地下的考古材料，我们推测，在原始人类进化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时，即动作语言及意象语言时期，原始人类的方位概念，如上下、东西等就慢慢开始树立了。

与中国考古遗迹相对应的，大致为从北京人时期到山顶洞人时期（距今

<sup>①</sup> 晚期智人在解剖学上又称现代人，一般指生活在距今 10 万至 1 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人类。中国的周口店山顶洞人、柳江人都属于解剖结构上的晚期智人。

约 18 000 年) 就已经有比较清晰的方位意识了。现有资料表明, 陶器制作和石器磨制技术在中国境内出现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 1 万年, 亦即 1.2 万年前。<sup>[2]18</sup> 陶器的制作说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语言已相当成熟, 完全进入了概念语言时期, 即分音节语言相当发达, 语义的表达相当明确, 方位概念为大家普遍接受。否则这些精巧的生活用具是无法制作出来的。

## 第二节 方位字的由来及古今研究状况

### 一、方位字的产生

与方位概念产生的原理一样, 方位字的产生, 也是随着文字的萌芽而逐渐产生的。无论是远古的关于指南车的传说, 还是考古的遗迹——如 2003 年发现于山西襄汾帝尧时代的陶寺观象台都已清晰地表明, 尧舜时代的人类已经有了东南西北中方位概念的精确表达了<sup>[4]373-383</sup>, 否则他们无法进行天象的观测和标记, 这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的。

从另一个角度, 我们也发现了人类最初方位概念表达的一些符号。那就是半坡文明彩陶上的符号。

#### (一) 彩陶文化与八卦图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

最早出现于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的大汶口文化, 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代表。大汶口文化遗址包括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 距今约 4 500 至 6 400 年。大多数学者认为, 大汶口文化早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 而它的中晚期很可能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其晚期文化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三皇五帝”时代相衔接。

在大汶口文化中, 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陶器, 有黑陶、灰陶、白陶、彩陶、红陶等好几个种类。尤其是彩陶器皿, 做工考究, 花纹精美, 图形比较有规则 (见图 1-1、1-2), 可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半坡遗迹中的人面鱼纹盆相媲美 (见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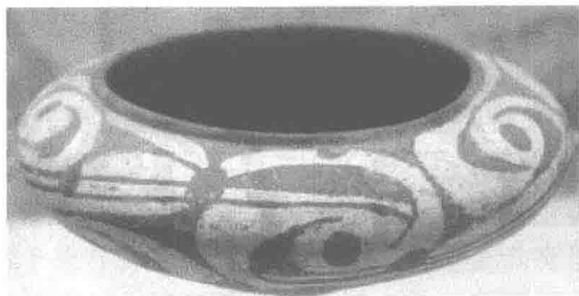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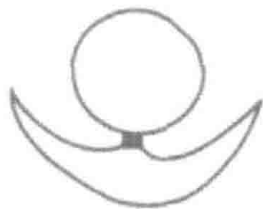
图 1-1 彩陶曲腹盆<sup>①</sup>图 1-2 大汶口文化彩陶盆<sup>②</sup>图 1-3 人面鱼纹盆<sup>③</sup>

图 1-4 “昊”字、“杲”字，还是“皋”字

无论是仰韶文化还是大汶口文化，其出土的陶器中都发现了多种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与文字的起源有极大的关系。一般认为，文字起源于实物记事、图画记事、氏族图腾等。其中，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西安半坡村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被部分研究者视为文字的萌芽，虽然人们对它是“昊”字、“杲”字或“皋”字争论不休（见图1-4）。而图1-3所示的刻画符号则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八卦的起源。

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半坡及姜寨村落遗址中出土的人面鱼纹盆（如图1-3），在盆口沿上使用不同的符号画着八等分，这八等分可能象征着八卦图中的四正四隅，或四伸四维，围绕着盆口沿上饰八等分符号，代表圆。圆是我国古人宇宙观中的天地观念。天代表阳，地代表阴，天地观念与阴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盆中饰人、鱼、鹿等图像，其表示四伸四隅八等分符号的周而复始与旋转。这种旋转所表示的无休止的运动，正是我国古代阴阳学说的主要特征。这八等分符号的格局与流传的八卦图式基本相同。盆口沿上的

①② <http://www.njmuseum.com/html/default.html>.

③ 参见梁君：半坡博物馆：第一座遗址性博物馆 [EB/OL]. [http://travel.cnwest.com/content/2006-07/04/content\\_233994.htm](http://travel.cnwest.com/content/2006-07/04/content_233994.htm).

八等分符号纹饰，代表着中国古代宇宙观的核心：天地、方圆及阴阳。盆口沿上饰两组不相同八个符号，四个“1”的符号纹饰，可能代表四方，四个“个”的符号纹饰，则代表着四隅……

半坡遗址和姜寨村落遗址出土的彩色陶盆，其口沿上所示的八等分符号，可能就是原始的八卦图，或者是象征着当时天圆地方的宇宙观。<sup>[5]3-12</sup>

## （二）方位字有可能与八卦图中的符号有关

上一节我们论述过方位概念的起源问题。自从思维与语言在人类改造自然、改造自身的过程中逐渐萌芽，到极其缓慢地发展，以至于一两百万年后渐渐走向成熟，其过程是十分漫长的。或许有坦途，也有黑暗，其复杂的演化史不是我们后人所能想象和描摹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其基于自身和生产生活的范围的认知，是早就开始了的。据一般保守的推理，人类的语言在四五十万年前就比较成熟了。

有人把语言比作一张纸，正面是思维，反面是声音。我们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还不够科学。从人类演化史来看，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人类语言也是从鸟的鸣叫声、猿猴的哀啸声中演化而来的。因此，人类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载体，更是情感的载体。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不予以展开。

而“语言—思维—时空”概念，应该是三位一体的。连动物都知道白天与黑夜的区别，天空与大地的方位，更何况是人类呢？尽管当时的远古人类脑容量不大——北京猿人的脑容量只有1 075毫升，思维能力极其有限。但是从动物也有方位感知能力的角度来讲，人类当时有方位概念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

至于方位概念是如何表现出来的这一问题，倒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正如上文第一部分所述，发现于山西襄汾帝尧时代的陶寺观象台，清晰地表明了当时人们已具备观测太阳方位的能力。但是方位是如何作标记的呢？换言之，是用什么东西来进行标记的呢？这时八卦符号便跃入了我们的眼帘。

八卦中，三条“一”（横线）及其组合而成的八卦图所表达的最初观点，应该和方位有关。

据《周易》的相关资料，最早记录四方或八方的词语可能不是“东、南、西、北”及其组合，而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其中“震”表示东方，“离”表示南方，“兑”表示西方，“坎”表示北方。而最初的方位，很有可能不是用“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或“东、南、西、北”来表示的，而是使用了最简单易写的卦号。

这种说法是有历史典籍依据的。一般认为，文字的产生，与八卦、伏羲



是密切相关的。

无论是《白虎通义》中论述三皇的文字，还是《易传·系辞》中的语句，都显示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已发展到有文字产生的阶段了，虽然是远在公元前数千年的伏羲氏时代，但是跟前代比，已是相当发达了。<sup>①</sup>下面让我们通过《白虎通义》来了解一下当时人类社会的真实状况：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饥弃其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sup>②</sup>

这种说法，古代文献中曾多次提及：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sup>③</sup>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sup>[6]298</sup>

由此可见，“八卦”产生的根源，是当时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当人们的需求和认知能力已不仅仅停留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时，人类的羞耻感、家庭观念、方位概念等相关意识几乎也同时产生了。

从古已有之的“九州”及后来的“中国”概念，到至今沿用的“四面八方”等观念，无不昭示着，《易经》提出的“八卦”概念及其隐含的“方位”观念绝非空穴来风或后人的杜撰。

常秉义（2005，21）认为，在上古时期，人们的方位概念是南在上，北在下，左为东，西在右；乾为上，坤为下，离为左，坎为右。

古太极图中，东、南、西、北等方位与八卦的对应次序，如图1-5所示；上、下、左、右等方位与八卦的对应次序如图1-6所示。

古太极图与先天八卦图中，其方位概念与今天的地图方位的标识是不一样的。它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方位的认知水平。

① 吕思勉先生认为这时已进入了游牧社会——因为从“伙婚制”过渡到了“家族制”。参见吕思勉·中国通史[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30。

② 转引自（东汉）班固，应劭，四部丛刊·字部《白虎通德论·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0-11。

③ 四部丛刊·经部《周易·系辞》。